

“美国优先”长期化：民粹主义 外交的民意基础

付 舒

摘要 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特别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政治浪潮的高涨，重塑了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格局。厘清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内核及其背后的民意基础，有助于把握美国外交的未来走向。理论上，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口号的民粹主义外交，可归纳为政治维度的“反多边主义”、经济维度的“反全球主义”以及文化维度的“反价值观外交”。实证上，利用两份全国性民调数据，采用跨问卷插补与匹配方法，可识别出美国民众政治、经济、文化维度的危机感与民粹主义对外政策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政治民粹倾向显著增强了孤立主义、轻视盟友和反国际组织的态度；经济民粹倾向显著提升了对关税的支持；文化民粹倾向则强化了对民主推广与多元价值的排斥。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的形成并非偶然，其具有广泛的舆论与社会基础，是国内政治失信、经济不平等与文化焦虑的外溢结果，并可能长期影响美国外交实践，使其在国际体系中延续更具内向化的政策取向。

关键词 “美国优先” 民粹主义外交 公众舆论 特朗普
国内政治

* 付舒，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上海 200030）。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特朗普对美国涉外官僚机构的重塑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5BGJ01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复现数据与代码详见哈佛大学数据库，<https://doi.org/10.7910/DVN/OXXI44>。感谢《外交评论》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感谢李泽涵、郭健锋的研究助理工作，文中错漏由作者负责。

引　　言

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populism）的兴起，尤其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政治浪潮勃兴，成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民粹主义通过挑战既有政治建制与国际秩序，深刻重塑了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取向。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其几乎颠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传统大战略，美国外交政策日益呈现民粹化取向。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为政治口号的特朗普式民粹主义外交实践，从“退群外交”到“关税外交”再到“反价值观外交”，无不偏离了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外交传统。^①然而，与国内政治层面的民粹主义研究相比，^②学界对于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系统性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③如何在理论层面理解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形成逻辑？特朗普看似“离谱”的外交政策是偶然的，还是美国国内政治出现结构性转变的必然结果？这些都是学界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在当前国际体系剧烈变动与国内政治极化加深的背景下，探讨美国民粹主义与外交政策的关联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民粹主义的兴起正在重塑美国政治版图，其反精英、反全球化、反移民的诉求日益渗透至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另一方面，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多聚焦于制度、利益与安全逻辑，而忽视了民意与国内社会结构变化的深层作用。因此，系统分析民粹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助于理解“美国优先”政策的根源和未来发展趋势，揭示民主政治与国际秩序互动的新机制，并为评估美国外交走向以及中国的政策应对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① 罗伯特·佐利克：《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余乐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第596—621页。

^② 陶文钊：《“特朗普现象”剖析》，《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6期，第3—15页；肖河：《美国反建制主义和特朗普政策》，《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第62—94页；付随鑫：《美国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运动及民族主义的复兴》，《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5期，第34—46页；张景全：《民粹主义思潮下的特朗普政府内政与外交》，《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2期，第48—56页；丛日云：《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论西方知识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误区》，《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第118—137页；William Galston, *Anti-pluralism: The Populist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C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William G. Howell and Terry M. Moe, *Presidents,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③ 王联合：《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外交影响》，《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19期，第101—111页；赵明昊：《保守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冲击与中美长期战略博弈》，《外交评论》，2025年第1期，第66—91页；钟准、魏康婷：《理解民粹主义外交——国际制度、国内建制与反建制对外政策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5期，第96—120页。

本文聚焦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作者认为，“美国优先”并非单一的政治口号，而是国内民粹主义情绪在外交领域的制度化表达。实际上，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孕育于政治失效、经济放缓与身份危机三个维度的背景之中，是美国民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焦虑心态在国际事务中的投射。具体而言，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可分为三种相互关联的取向：其一，政治维度上的“反多边主义”(anti-multilateralism)，体现为对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体系的普遍怀疑；其二，经济维度上的“反全球主义”(anti-globalism)，表现为对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市场机制的抵制；其三，文化维度上的“反价值观外交”(anti-value-based diplomacy)，表现为对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外交”议程的反对，而将主权和民族认同置于普世价值之上。本文提出三项核心假设，即政治危机感促生“反多边主义”、经济危机感推动“反全球主义”、文化危机感强化“反价值观外交”。通过系统的实证分析，本研究揭示出，“美国优先”并非偶发的外交偏离，而是深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是一种民众集体心理的系统性政治表达，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国优先”取向将呈现长期化趋势。

本文的实证部分将联合使用两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民调数据，即 2020 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下文简称 ANES) 和 2022 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下文简称 CCGA) 的民调数据。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在 ANES 中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的民粹倾向；其次，鉴于 ANES 缺乏系统的对外政策偏好题项，^① 为搭建“民粹倾向-外交态度”的桥梁，本文以两份问卷共享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如投票选择、意识形态、党派认同、教育、收入、种族、年龄、性别、婚姻、住房等）为共同协变量，在 ANES 数据中训练预测模型，并将其外推至具有丰富对外政策偏好题项的 CCGA 数据，从而实现对 CCGA 受访者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数进行“跨问卷插补”(cross-survey imputation)；再次，针对“单一维度的焦虑感促生该维度对外政策偏好”的路径，在条件忽略（基于观测的选择）的识别框架下采用匹配方法，利用其余两个维度的民粹倾向值作为匹配协变量，以评估政治、经济、文化焦虑感与该维度对外政策偏好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具有政治民粹倾向的民众在国际事务中普遍持有孤立主义态度，并对盟友、国际组织保持怀疑立场；具有经济民粹倾向的民众支持提高关税、降低全球贸易的优先级；具有文化民粹倾向的民众更反对在全球

^① “对外政策”与“外交政策”二者虽相互关联，但却不完全等同，“对外政策”一般强调的是民意层面的态度与偏好，而“外交政策”则强调的是国家层面的行动与制度体现。

推广民主价值，对多元价值观持反感态度。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案例分析，进一步印证了民粹主义危机感与外交政策的联动机制。总体来看，“美国优先”的外交取向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与舆论基础，并非领导人个性风格的偶发产物，这意味着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具备延续性，也将在相当程度上长期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走向。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层面，本文从民粹主义的国内诱因出发，系统构建了民粹主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上的具体对外政策偏好框架，揭示了美国民粹主义外交“反多边主义”“反全球主义”“反价值观外交”的完整逻辑结构，为理解民粹主义外交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分析框架；第二，在实证方法层面，本文超越了相关性分析，利用跨问卷插补与匹配方法，在条件忽略识别假定下，初步识别了政治、经济、文化危机感对外交政策偏好的因果效应，从而更精确地分析了民众的民粹主义态度与外交政策偏好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在政策层面，本文考察了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社会舆论基础，揭示了“美国优先”具有长期化发展的趋势。概言之，民粹主义外交并非仅源于特朗普个人的执政风格，而是深植于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政治不信任、经济焦虑与文化防御集体心理之中，即便特朗普卸任，若出现其他具有民粹特质的领导人，美国的外交取向仍可能沿着相似路径延续。

一、民粹主义与外交政策：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近年来，关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的研究不断涌现，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内政和外交两个方向：一方面，民粹主义的研究文献主要着眼于国内政治，聚焦民粹主义现象、概念及其国内诱因；另一方面，最新的文献初步探讨了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以下将依次回顾这两方面的研究，并说明它们如何共同启发了本文的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

(一) 民粹主义的定义及其国内诱因

民粹主义的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突出现象，对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还是在非西方的“全球南方”国家，民粹主义都以不同形式冲击着传统政治秩序。^① 学界普遍

^① 田野：《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林红：《威权、福利与庇护：民粹主义在非西方世界的激荡之旅——基于拉美与东南亚经验的考察》，《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第93—121页。

认为，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反制。^①正如卡斯·穆德所界定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核心薄弱的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主张“纯粹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对现有的政治秩序进行抵制、扰乱与破坏。^②纳迪亚·乌尔比纳蒂则指出，民粹主义在形式上延续了民主政治的“多数原则”，但在实质上将其转化为“多数的暴政”，以选举合法性对抗制度约束。

以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为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尤为如此。它在反建制的姿态中融入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乃至排外主义，使得“人民与精英”的冲突同时转化为“本国与他者”的冲突。李向阳等人认为，欧美右翼民粹浪潮的兴起，是在西方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失衡与文化冲突压力下的集体反应。^③乔治·洛夫曼在《英国政治与国际关系杂志》的专题研究论文中指出，当代右翼民粹主义已超越政党政治的范畴，成为一种跨国政治风格，它既挑战国内建制，也质疑国际制度的正当性。^④

随着民粹主义实践日益多样化，单一的“反精英”分析框架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学界开始从多个维度解构民粹主义的反精英诉求。具体而言，政治上，民粹主义依托“孤胆英雄式”的政治强人以动员底层民众；经济上，它反对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分配不公；文化上，它以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标准来定义“真正的人民”。^⑤这种多维视角也使学界对民粹主义诱因的讨论更加聚焦且更具解释力。

首先，政治危机感是民粹主义兴起最直接的诱因之一。当政府腐败、政策失灵或政党极化削弱了公众对体制的信任，民粹主义便成为反体制动员的工具。拉丁美洲在 20 世纪中叶的经验表明，胡安·庇隆、乌戈·查韦斯等领袖的崛起正源于拉美民众对政治建制派的强烈不信任。^⑥同样，在欧美民主国家中，政治极化与制度僵化也为民粹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土壤。有西方学

^① 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10 期，第 68—75 页；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

^②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9, No. 4, 2004, pp. 541-563.

^③ 李向阳等：《全球右翼浪潮兴起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5 年第 4 期，第 9—44 页。

^④ Georg Löfflman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The Study of Popu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 No. 3, 2022, pp. 403-415.

^⑤ 付舒：《谁在支持特朗普：实证分析美国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科学》，2024 年第 4 期，第 73—107 页。

^⑥ Frederick Turner and José Enrique Miguens, eds., *Juan Perón and the Reshaping of Argentin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3; Kirk A. Hawkins, *Venezuela's Chavismo and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者研究表明，持续加剧的党派极化正在侵蚀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使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显著下降。^①与此同时，政党钙化（calcification）和政治僵局（gridlock）进一步放大了民众对代议制的失望情绪，导致了政府信任危机，从而为反建制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动员空间。^②

其次，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冲击是民粹主义崛起的第二大诱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使得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加上全球化所带来的制造业衰退危机，共同加剧了民众的经济焦虑感。全球化的赢家多为金融与科技精英，而蓝领阶层、农村地区及中下阶层的民众则成为那群被遗忘的人。^③右翼民粹主义者将复杂的全球经济失衡简化为“外部敌人”问题，通过反全球贸易与关税保護政策来回应国内不满。经济危机感不仅是民粹政治动员的基础，也为其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正当性。

再次，民粹主义勃兴的第三个诱因来自文化与身份层面。全球化与移民潮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挑战了民族国家的认同边界。在经济衰退与难民潮的双重压力下，西方社会出现了对移民与多元文化的强烈反弹。^④同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右翼民粹叙事的重要思想资源。^⑤比如，特朗普的政策顾问史蒂夫·班农便将美国视为“西方文明的捍卫者”，把反移民与反多元文化包装为文明保卫战。^⑥这种以文明论为基础的反全球主义叙事，使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社会获得了持久的文化合法性。^⑦

（二）对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既有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逐渐从国内政治层面扩展至国际关系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民粹主义的外交政策取向。民粹主义外交被视为国内民粹主义政治在国际舞台的延伸，其核心特征在于挑战由国内建制与

^①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Crown, 2018.

^② 关于政党钙化，参见 John Sides, Chris Tausanovitch and Lynn Vavreck, *The Bitter E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关于政治僵局，参见 Nolan McCarty, *Polarization: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关于政治信任，参见 Marc J. Hetherington and Thomas J. Rudolph, *Why Washington Won't Work: Polarization,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Governing Cri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③ John B. Judis, *The Populist Explosion: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6.

^④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⑤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6.

^⑥ Joshua Green, *Devil's Bargain: Steve Bannon, Donald Trump, and the Storming of the Presidency*, Penguin Press, 2017.

^⑦ 李向阳等：《全球右翼浪潮兴起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第11页。

精英共识所支撑的国际制度与全球化秩序。钟准与魏康婷对民粹主义外交这一全球性现象进行了规律性探讨，强调民粹主义外交是一种对国际制度和国内建制的双重反制，他们通过案例分析了三种不同类型反建制外交（讨价还价、策略性不合作与制度性退出）的条件，明晰了在不同条件下民粹主义外交的选择及其作用机制。^①

聚焦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的学术探讨已开始起步，理论框架也逐渐清晰。王联合从理念与历史脉络出发，强调美国民粹主义外交以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来界定国家身份，对外政策优先关注国内利益而非国际利益。^②赵明昊研究了美国保守民粹主义的崛起，从“非自由主义民主”、强化美国实力、强势的单边主义三个方面概括了特朗普的外交理念，为运筹中美长期战略博弈提供了富有洞见的政策启示。^③

不过，针对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这一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议题，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第一，关于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现有文献虽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对民粹主义的诱因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但对于不同维度的民粹倾向分别对应哪些具体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仍需开展类型学层面的系统分析。第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描述性分析外交理念及其政策表现，缺乏对民粹主义外交的微观机制、民意基础及社会根源的系统检验。民粹主义的对外政策偏好是否具有广泛的民意支持，仍亟待进一步研究。^④如果民粹主义确实以“人民意志”为其政治正当性的基础，那么，当民众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冲击时，他们究竟持何种对外政策立场，仍是一个尚未被充分验证的经验性问题。第三，系统性检验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根源，仍需要科学实证方法的支撑。近年来，经济学与政治学中方兴未艾的“可信度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为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严谨的因素推

^① 钟准、魏康婷：《理解民粹主义外交——国际制度、国内建制与反建制对外政策的选择》，第 96—120 页。

^② 王联合：《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外交影响》，第 101—111 页。

^③ 赵明昊：《保守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冲击与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第 66—91 页。

^④ 对外政策舆论的相关文献为民粹主义外交的民意基础这一较新议题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实证依据。早期的公众舆论文献认为民意缺乏结构化和连贯的信念体系，参见 Walter Lippman, *Public Opinion*,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2; Philip E. Convers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David E.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Free Press, 1964, pp. 206–261; John R. Zaller,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伴随大样本民调数据的逐步积累，实证研究亦表明，聚合后的公众意见并非完全凌乱无序，而对国际事务具有稳定的偏好结构，而且，在不少政策领域，公共政策往往与多数民意保持一致，参见 Valdimer Orlando Key, Jr.,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lfred A. Knopf, 1961; Benjamin I. Page and Robert Y. Shapiro, *The Rational Public: Fifty Years of Trends in Americans' Policy Prefere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断工具，使学者能够以更科学的方式识别民粹主义诱因与特定对外政策态度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深化我们对民粹主义政治心理与对外政策偏好之间作用机制的理解。

二、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

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是指以“美国优先”为发展理念，强调在国际事务中优先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反对精英主导和制度性国际合作的一种外交取向。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的具体政策表现可以概括为政治维度上的“反多边主义”、经济维度上的“反全球主义”以及文化维度上的“反价值观外交”。这三种取向共同构成了特朗普时代“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民粹主义情绪在对外政策态度层面的进一步延伸。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美国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孕育于美国政治失效、经济放缓以及身份认同危机，是美国国内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焦虑感在国际问题领域的外溢。

首先，在政治维度，民粹主义的核心是反精英主义，这种反精英心理在外交领域表现为对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排斥。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多数主义的反精英政治”，它主张政治权力应当完全体现“人民意志”，并将制度化政治视为对人民意志的扭曲。^① 在民粹话语中，国际制度和多边机制往往被描绘为“全球精英的产物”，这些精英通过复杂的规则体系、外交惯例和国际组织架构削弱了国家主权，规避了民主问责，并将决策权让渡给远离公众的跨国机构，因此，国际组织、联盟与多边条约往往被民众视为“全球精英”的权力延伸。右翼民粹主义者把对国内建制派的不信任投射到国际体系中，便形成了对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多边制度性承诺的深刻怀疑。这种反多边主义态度既是美国孤立主义传统在民粹时代的延续，也反映出在当今国际秩序变化进程中美国外交战略从自由国际主义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深刻转变。^②

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外交”正是这种政治民粹逻辑的集中体现。特朗普先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威胁退出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并冻结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这些行动的共同逻辑在于拒绝承担美国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在政治维度上，以

^① Nadia Urbinati, “Political Theory of Popu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No. 1, 2019, pp. 111-127.

^② 徐步：《鹰霾笼罩：美国国家特性及其21世纪战略影响》，五洲传播出版社，2025年。

“反多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民粹外交，使美国从过去的国际秩序维护者转变为制度怀疑者。

其次，在经济维度，民粹主义外交政策表现为对全球化的抵制，是一种典型的“反全球主义”取向。其理论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虽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增长与互联，却在国内层面形成严重的收益分配不均和产业空心化，从而引发了深层次的社会焦虑，为民粹主义在经济维度的发展提供了动员基础。^①伴随着制造业的大量外迁，原先从事制造业的民众感到自身被全球经济体系“遗弃”，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关税壁垒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强调国家应重新掌控经济发展命脉，拒绝生产外包，限制跨国资本流动，恢复制造业就业，提升产业竞争力。

在这一逻辑下，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与经济政策可被视为经济民粹主义的典型实践。特朗普不仅在其第一任期内就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还在第二任期伊始扩大贸易战范围，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征收关税，试图通过“极限施压”方式迫使对方在贸易谈判中让步。^②他以“公平贸易”的幌子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推动签署《美墨加协定》(USMCA)，并将关税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工具，以此吸引国内中下层劳动者的支持。这些经贸举措是以保护主义取代自由贸易、以经济民族主义取代全球化合作的政治重构。

再次，在文化维度，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反价值观外交”，其深层逻辑在于对多元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系统性抵制。民粹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一种排他性政治，它通过界定“真正的人民”来划定政治共同体的文化边界，并以此反对多元文化与普世价值。换言之，文化民粹主义的背后是一种对文化秩序失控的恐惧与对传统社会等级的怀旧。皮帕·诺里斯与罗纳德·英格拉哈特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即随着性别平等、种族多元与移民扩张的加速，传统群体（尤其是白人、基督徒以及低教育水平群体）在面对社会价值变迁时会产生一种防御性的政治反应。^③当白人群体的传统优势地位受到冲击时，他们会产生物价焦虑与防御性文化心理，更倾向于拒绝跨国人权机制、削减援外项目、淡化民主推广议程，从而

^① 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Vol. 1, Issue 1-2, 2018, pp. 12-33.

^② “Regulating Imports with a Reciprocal Tariff to Rectify Trade Practices That Contribute to Large and Persistent Annual United States Goods Trade Deficits,”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regulating-imports-with-a-reciprocal-tariff-to-rectify-trade-practices-that-contribute-to-large-and-persistent-annual-united-states-goods-trade-deficits/>.

^③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在制度上强化国家主权与文化同质性的优先地位。

特朗普政府在文化维度的民粹主义表现尤为突出，其政策系统性地削弱了美国长期以来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传统。在移民政策领域，特朗普签署“禁穆令”，限制多个穆斯林国家国民入境，并大幅削减难民接收数量。在对外援助与国际合作方面，他冻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项目经费，并大幅削减对民主、人权和气候议题的外援资金，甚至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公开质疑人权理事会的合法性。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言，这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衰退”，美国不再将传播价值观视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是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导向的外交。^①

综上所述，这三个维度的民粹主义对外政策取向，分别根植于美国民众的政治危机感、经济危机感与文化危机感。伴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也往往发生于美国民众对政府信任、经济安全与社会认同均感到失望的时期。政治危机感源自民众对政治代表性与政府信任的缺失；经济危机感反映民众对全球化导致分配不公的反弹；文化危机感则体现了民众对多元主义与身份变迁的焦虑。就外交政策而言，政治危机感强的群体更倾向于孤立主义，认为维持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弊大于利，应减少对盟友的承诺，并反对参与国际组织；经济危机感强的群体更支持关税与贸易保护政策；文化危机感强的群体则更反对推广民主价值观，认为民主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最好的制度，同时反对文化多样性。据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 1：政治民粹倾向越强，个体越倾向支持“反多边主义”外交政策。

假设 2：经济民粹倾向越强，个体越倾向支持“反全球主义”外交政策。

假设 3：文化民粹倾向越强，个体越倾向支持“反价值观”外交政策。

这三条假设共同构成了从理论到实证的桥梁。^② 它们揭示了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的社会心理根源，也说明“美国优先”的政治逻辑并非源于个人领导风格，而是建立在社会结构性危机与集体情绪反应之上。因而，民粹主义外交不只是政策层面的短暂偏离，而是一种长期的社会政治转型：因为政治危机感所以质疑国际制度，因为经济危机感所以否定全球化，因为文化危机感所以抵制普世主义，从而在国际层面投射出一种系统性的“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② 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中文文献中，“hypothesis”一词常被译为“假设”或“假说”，但本文统一采用“假设”以指代可通过实证检验的研究命题。后文出现的“假定”对应的是“assumption”一词，指研究模型或因果识别中所设立的前提条件或约束。

三、研究设计：如何识别民众民粹倾向 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部分旨在系统地分析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是否具有民意基础，探求具有民粹倾向的美国民众是否更加支持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然而，系统检验民众的民粹主义倾向与对外政策偏好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借助的调查数据不太完备。研究者使用的民意调查数据需要同时满足两点：一是能够对民众心中与民粹主义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感进行测量，二是能够对民众具体的外交政策偏好进行测量。然而，民粹主义倾向的测量通常依赖大量国内政治议题的题项，这类民调往往缺乏对外政策题项，而专注于对外政策议题的民意调查却又缺乏直接测量民粹主义倾向的题项。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通过巧妙的方法识别出三个维度的危机感对具体外交政策偏好的因果影响，而简单的回归分析难以控制所有可观测与不可观测的混淆变量，从而很难对因果效应做出无偏估计。本节将具体介绍本文克服以上两种难题的研究设计。

（一）数据：基于 ANES 与 CCGA 民调测量民粹主义对外政策

本文的实证分析使用两份民调数据，即 2020 年 ANES 以及 2022 年 CCGA 的民调数据。ANES 是美国一个长期开展的社会科学项目，自 1948 年起延续至今，其目标是研究美国选民的政治行为和政策态度，并以全国概率抽样的方式收集美国公众在选举期间的政治态度与行为信息。尤其在总统大选年，ANES 提供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调查数据，涵盖了选民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党派立场、意识形态偏好以及与选举相关的核心议题，因此，其长期是研究美国政治行为与公众舆论的重要资源。与之相辅的是 CCGA 的外交事务调查。该调查自 1974 年开始实施，聚焦美国公众与精英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认知与偏好，它被广泛用于研究美国社会对国际事务和外交战略的看法，在学界和政策界具有极高的影响力。CCGA 每隔数年开展一次大规模调查，涵盖贸易、联盟、军事部署、移民与国际合作等议题。本文使用的 2022 年 CCGA 民调数据^①能够较为全面地揭示当今美国民众在具体对外政策上的态度和偏好。

^① 这也是研究者所能够获得的最新的民调数据。

不过，单独依靠任何一份民调数据都难以同时把握民粹主义与民众对外政策态度的关系。ANES 数据的优势在于，它包含了大量与国内政治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使得研究者能够通过因子分析构建民粹指数，即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的焦虑感来衡量民粹诱因。但是，ANES 数据并未涉及系统性的对外政策态度问题，难以全面测量美国公众在对外政策上的态度。相对而言，CCGA 数据在对外政策维度有着丰富而细致的问卷设计，从贸易到军事、从多边主义到地缘竞争，该调查均有覆盖，因此，其是研究美国公众对外政策偏好的核心数据来源。然而，CCGA 数据并没有足够的问题来测量受访者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一限制使得单独使用 CCGA 数据无法系统地开展民粹主义与外交政策关系的研究。

为克服两份数据各自的局限，本文采用了“跨问卷插补”的策略。首先，作者利用 2020 年 ANES 数据中的丰富题项，复现已有研究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以构建民粹指数。^① 随后，在 ANES 与 CCGA 调查的共同协变量基础上（如投票选择、意识形态、党派认同、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等），建立统计预测模型。换言之，该步骤把 ANES 数据视为训练集（training set），构建如何用众多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预测三个维度民粹焦虑感的统计模型。最后，论文将所得模型应用于 CCGA 样本，利用共享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对 CCGA 受访者三个维度的民粹焦虑感进行预测并加以填补。这一跨问卷插补方法不仅在实质上实现了两个数据集的联通，也使得作者能够在 CCGA 数据的对外政策题项基础上填补受访者的民粹主义倾向，从而为系统分析“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态度”关系提供了可能。在接下来的两个小节，作者将对每一步方法的实施进行详细介绍。

（二）因子分析与民粹指数测量

在民粹主义的实证研究中，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测量民众潜在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本质上体现为“人民对精英”的对立逻辑，而这种倾向往往根植于公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上的焦虑感。民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焦虑感越高，就越容易拥抱民粹主义，具有更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对于一位受访者而言，他对民粹主义的青睐程度是潜在的，再加上民粹主义往往带有贬义，易受社会期许的影响，因此，民粹主义倾向难以直接观测。

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间接测量受访者的民粹主义倾向。因子分析假定多个观测变量之间的方差-协方差结构能够由数量更少的潜在因子加以解释。这些潜在因子本身不可直接观测，但会系统性地影响观测变量所

^① 付舒：《谁在支持特朗普：实证分析美国民粹主义》，第 73—107 页。

表现出的共同特征与维度。本文使用 2020 年 ANES 数据，选取能反映三类焦虑感的问卷题项作为观测变量。相关问题的选择均从民粹的概念出发，选取在政治、经济和身份三个维度的民粹主义诱因所关联的具体问题。政治维度涉及对政客与制度的信任感，问题包含“政客是否在意人民”“政府里有多少人腐败”“个人能否影响政府”“对华盛顿政府的信任程度”等八个问题；经济维度涵盖民众对贸易、移民与金融风险议题的看法，问题包括“移民是否抢走工作”“对自由贸易协定的看法”“与他国贸易是否对美国有好处”“移民对美国经济是否有好处”等五个问题；文化维度聚焦于民众对待移民与少数群体的态度，问题包括“是否支持在美墨边境修墙”“对非法移民的感情温度”“外国移民应该增加还是减少”“遵照美国的风俗习惯有多重要”等八个问题。^①

在统计层面，作者通过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与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检验各维度的内在信度。结果表明，三类因子均有较好的拟合，其中，文化维度的一致性最高（CFI=0.981，Cronbach=0.874），政治维度的内在效度也很高（CFI=0.936，Cronbach=0.798），经济维度的效度略低但仍可接受（CFI=0.814，Cronbach=0.573）。作者依据载荷系数对各题项进行加权，构建出政治民粹指数、经济民粹指数和身份民粹指数，并将其标准化到 0 与 1 区间，其中 0 代表没有民粹倾向、1 代表极高的焦虑与民粹倾向。

（三）跨问卷插补：实现民粹指数与对外政策态度的整合

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经常会面临单一问卷的束缚。某些核心变量虽在一份问卷中被测量，但在另一份问卷中却缺失，致使关于对外政策舆论的研究面临“有什么数据就做什么样的研究”的困境。^② 若直接舍弃缺失的部分，不仅会限制对更有趣问题的探究，还可能削弱样本的代表性与可靠性。随着近年来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学界常用的解决方法是跨问卷插补。这一方法的核心思想在于，利用两份问卷中同时存在的“共享变量”作为桥梁，在一份问卷中训练预测模型，并将模型参数应用于另一份问卷，从而预

^① ANES 问卷具有非常高质量的问卷连续性，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两次 ANES 民调中，以上问题完全一样。本文的分析基于 2020 年的 ANES 民调数据，对三个维度民粹倾向的测量复现了付舒于 2024 年发表在《国际政治科学》一文对民粹指数的测量。更为具体的测量细节，参见付舒：《谁在支持特朗普：实证分析美国民粹主义》，第 73—107 页。

^② 张传杰：《中国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外交评论》，2011 年第 5 期，第 49—58 页。

测并填补缺失的目标变量。^① 在关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尤其常见，例如，当研究者希望将不同年份或不同调查机构的数据拼接，以形成更完整的时间序列或更全面的样本时，跨问卷插补便成为关键工具。它不仅延伸了数据资源的可比性，也使研究者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考察舆论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普遍性规律。

在本研究中，作者利用 ANES 数据构建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对三个维度的民粹主义倾向的预测模型。如前文所述，ANES 问卷包含了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维度的政策态度问题，从而可以利用因子分析测量受访者的民粹主义倾向，以获得政治危机感、经济危机感与文化危机感的测量值。同时，ANES 与 CCGA 数据共享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这些变量既在两份问卷中均有收录，又与民粹主义态度高度相关，因而，可以作为预测模型的输入变量。具体而言，作者选取的共享变量包括 2020 年大选是否投票给特朗普、意识形态、党派认同、宗教信仰（新教、天主教）、是否拥有住房、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种族（白人、黑人、拉美裔）、教育水平与收入。在既有研究中，这些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已被证明与民粹主义倾向存在相关性，因此，其为预测三类民粹指数提供了坚实基础。^②

在具体建模过程中，作者在 ANES 数据中利用上述共享的社会经济变量对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数分别进行拟合。为在解释力与准确性之间取得平衡，作者采用了多种模型方法：其一是最直观的最小二乘线性回归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其优势在于易于解释，并且能够提供条件期望函数的最佳线性近似；^③ 其二是更为灵活的完全饱和模型（fully saturated model），即对共享变量的所有可能组合进行建模，以捕捉交互关系；其三是机器学习方法中的随机森林模型（random forest），能够在非参数框架下自动捕捉复杂的非线性与交互效应。^④

^① Donald B. Rubin, *Multiple Imputation for Nonresponse in Surveys*, Wiley, 1987; Gary King et al., “Analyzing Incomplete Political Science Data: An Alternative Algorithm for Multiple Impu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1, 2001, pp. 49-69; Roderick J. A. Little and Donald B. Rubin,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Missing Data*, Wiley, 2019.

^②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③ 关于 OLS 线性回归模型总能提供条件期望函数的最佳线性估计，参见 Ethan Bueno de Mesquita and Anthony Fowler, *Thinking Clearly with Data: A Guide to Quantitative Reasoning and Analy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99。

^④ Leo Breiman, “Random Forests,” *Machine Learning*, Vol. 45, No. 1, 2001, pp. 5-32; Susan Athey and Guido W. Imbens,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That Economists Should Know Abou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 11, 2019, pp. 685-725.

为了验证预测模型的准确度，作者采用留出法交叉验证（holdout validation）。^① 表-1 展示了交叉验证的结果，三种模型均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数，说明社会经济与人口特征变量对民粹态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整体预测表现来看，各模型在样本外测试集上的平均误差较小（RMSE 与 MAE 均在 0.2 以下），预测值与真实值的相关系数普遍在 0.3 至 0.8 之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中中等偏上的预测精度标准。并且，三种模型的预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跨问卷插补结果的稳健性。

表-1 三种模型预测的交叉验证

模型	RMSE	MAE	Correlation	样本数
政治维度				
最小二乘	0.176	0.144	0.334	1474
完全饱和	0.182	0.149	0.285	1474
随机森林	0.179	0.147	0.297	1474
经济维度				
最小二乘	0.152	0.112	0.544	1474
完全饱和	0.156	0.115	0.517	1474
随机森林	0.155	0.115	0.518	1474
文化维度				
最小二乘	0.132	0.104	0.826	1474
完全饱和	0.134	0.105	0.820	1474
随机森林	0.133	0.105	0.823	1474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比较三种模型发现，最小二乘线性模型的表现最优，在三个维度上均取得最低的预测误差与最高的预测值与真实值相关度。有趣的是，即便在较为简约的线性设定下，该模型仍能有效捕捉民粹态度的系统性变异，其预测效果与稳健性均优于完全饱和模型和机器学习模型。^② 因此，在后续因果推断分

^① 留出法交叉验证的具体做法如下：将 ANES 样本随机划分为两个互不重叠的子样本，其中，A 子样本作为训练集（training set），用于模型拟合，B 子样本作为测试集（test set），用于样本外预测验证。在训练集 A 中，作者基于全部社会经济与人口特征变量，分别采用以上三种不同的预测模型，对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数进行拟合，随后，在测试集 B 中评估各模型的预测表现。预测准确度通过三项指标加以衡量，即平均预测误差平方根（RMSE）、平均绝对误差（MAE）以及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线性相关（correlation）。

^② 最小二乘线性模型预测效果最好，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线性为主，随机森林和完全饱和模型差别不大，也间接说明了随机森林亦未捕捉到太多非线性关系；另一方面，完全饱和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往往在样本容量相对有限、变量维度较高或特征空间稀疏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过度拟合情况。

析中，作者主要依据线性回归的估计结果。并且，线性回归的透明性与可解释性最强，能够直接揭示各社会经济变量与民粹指数之间的线性关系及其方向。

在模型训练完成之后，作者将上述拟合模型应用于 2022 年的 CCGA 数据。CCGA 数据同样包含了与 ANES 相同的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通过模型预测，作者为 CCGA 的每位受访者构建了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数，从而实现了跨问卷插补。这一操作使得 CCGA 数据在保留其丰富的外交政策测量问题之独特优势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受访者民粹主义倾向的测量，从而为分析民粹主义者的对外政策态度提供了研究可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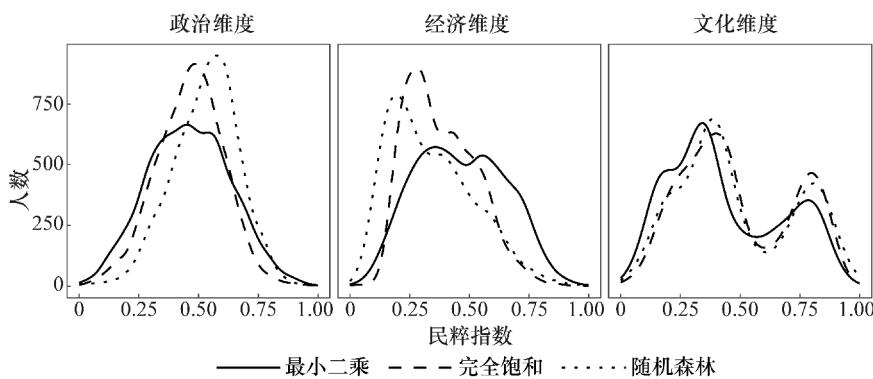


图-1 2022 年 CCGA 跨问卷插补的民粹指数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1 展示了在 2022 年 CCGA 样本中基于跨问卷插补方法所得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民粹指数的分布情况。整体来看，不同模型（最小二乘、完全饱和与随机森林）预测的结果分布较为一致，这说明插补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在政治维度上，民粹指数呈近似正态分布，显示大多数美国受访者在政治信任与精英态度方面持中间立场，仅有少部分个体表现出极端的政治不信任或强烈的反精英情绪。这种分布形态与 2020 年 ANES 数据的原始测量结果高度一致，也表明跨问卷插补较好地捕捉到了政治民粹态度的连续特征。在经济维度上，民粹指数分布略向左偏，这意味着总体上较少出现强烈的经济民粹倾向。这一结果与 2022 年美国经济在疫情后实现阶段性复苏的宏观背景相符，也反映出经济层面的反全球化情绪并非当下美国民粹主义的主要来源。相较之下，文化维度的民粹指数分布则呈现出明显的双峰形态，显示出受访者的观点在移民、种族平等与身份政治等议题上存在显著分化。一部分群体在文化态度上表现出较高的包容性与支持多元价值取向，而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支持更为保守、排外的文化立场。文化维度的双峰分布揭示出美国社会在族群与文化认同议题上的立场极化趋势，这也与近年来

公众舆论中围绕“白人身份焦虑”“移民威胁”等议题的激烈争论相呼应。^①

(四) 基于匹配的因果推断

借助跨问卷插补方法，我们已获得每位受访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上的民粹主义倾向指数，这为进一步分析民粹倾向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偏好提供了基础。根据 CCGA 数据中关于对外政策偏好的丰富问卷题项，作者总结出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的具体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变量。表-2 展示了在 2022 年 CCGA 数据中三个维度的对外政策偏好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依据前文的理论框架，政治维度上的民粹倾向越高，受访者越倾向于支持民粹主义的对外政策，例如主张孤立主义，认为维持美国世界地位弊大于利，质疑盟友关系与国际组织的有效性，甚至支持美国退出北约等；经济维度的高民粹倾向则更容易导致民众对贸易保守主义的支持，如倾向于赞同征收关税等；而在文化维度上，民粹倾向高的个体往往对民主输出与多元主义持怀疑态度，更可能反对价值观外交，认为民主制度并非普世适用，或认为多样性对美国并无益处。

为获得更可靠的因果推断，本文在条件忽略（conditional ignorability）或基于观测的选择（selection on observables）识别策略下，采用匹配方法（matching method）来估计不同维度民粹倾向对对外政策偏好的因果效应。匹配方法通过在观测数据中寻找特征相似的个体，以模拟随机实验设计中“干预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可比性。^②

具体而言，本文分别以政治、经济、文化维度的具体对外政策偏好为结果变量，以某一维度的民粹主义指数为干预变量，并以其均值为阈值：高于均值的受访者划入干预组，低于均值者则为控制组。随后，以其他两个维度的民粹指数作为匹配协变量，采用马氏距离（Mahalanobis distance）进行一对一最近邻匹配（nearest-neighbor matching），并设定卡尺（caliper）为 0.2 倍标准差，以确保匹配样本间距离足够接近。因果被估量可形式化地表达为：

$$\tau_{ATT} = \frac{1}{N} \sum_{D_i=1} (Y_i - \tilde{Y}_i)$$

其中， τ_{ATT} 表示干预组的平均干预效应，若以政治维度为例，即对政治民粹倾向较高的受访者而言，其某一外交政策态度 (Y_i) 与在经济与文化倾向上相似但政治民粹倾向较低的个体 (\tilde{Y}_i) 相比的平均差异。换言之，这里

^① John Sides, Michael Tesler and Lynn Vavreck, *Identity Crisis: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Meaning of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② Elizabeth A. Stuart, “Matching Methods for Causal Inference: A Review and a Look Forward,” *Statistical Science*, Vol. 25, No. 1, 2010, pp. 1-21.

比较的是某一维度“高民粹”与“低民粹”个体之间的对外政策态度差异，而两者在其他两个维度的民粹倾向上保持相似，从而更接近于“其他条件相同”的因果识别。因为匹配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所以估计的推断采用 Adadie-Imbens 标准误。^①

表-2 对外政策偏好结果变量的描述统计

问题	编码规则	均值	标准差
政治维度			
孤立主义态度：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应奉行孤立主义还是积极参与？	0=积极参与 1=孤立主义	0.331	0.471
世界地位态度：总体来说，维持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0=利大于弊 1=弊大于利	0.383	0.486
对待盟友态度：对于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维持现有盟友是否有效？	0=非常有效 1=非常无效	0.166	0.208
国际组织态度：对于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参与国际组织是否有效？	0=非常有效 1=非常无效	0.283	0.257
对待北约态度：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为何？	0=增加支持 1=完全退出	0.325	0.232
经济维度			
征收关税态度：向其他国家商品征收关税的态度为何？	0=非常无效 1=非常有效	0.588	0.262
全球贸易态度：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全球贸易是否为最高优先级？	0=优先 1=并非优先	0.802	0.399
文化维度			
民主外交态度：美国是否应该在全世界推广人权和民主？	0=强烈支持 1=强烈反对	0.296	0.308
民主制度态度：民主对所有国家都是最好的制度，还是对一些国家而言民主并非最好？	0=民主是普世的 1=民主并非普世	0.373	0.484
民主倒退态度：对美国而言，未来十年，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倒退是否是最大威胁？	0=巨大威胁 1=并非威胁	0.296	0.317
对多样性态度：不同种族和国别的人民对于美国是否有益？	0=巨大益处 1=毫无益处	0.306	0.29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在编码规则的设定中，1 均代表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众在理论上会支持的态度。

概言之，控制其他两个维度的民粹指数，是满足条件忽略的关键。第

^① Alberto Abadie and Guido W. Imbens, “Large Sample Properties of Matching Estimators for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Econometrica*, Vol. 74, No. 1, 2006, pp. 235-267. 另外，作者承认匹配结果的标准误有可能被低估，因为匹配的估计并未纳入跨问卷插补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但在数据与方法的限制下，这已是目前能够实现的非常稳健且可行的估计方式。

一，这些民粹指数源于因子分析并经跨问卷插补得出，插补模型中已包含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如投票选择、意识形态、党派认同、宗教信仰、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这些背景特征的控制；第二，仅利用两个连续变量进行匹配，能够有效规避“维度的诅咒”（curse of dimensionality），^①使得匹配后的样本在协变量分布上更加平衡；第三，由于三个维度的民粹倾向具有相关性，通过马式距离寻找最邻近匹配，能够在协方差结构下综合衡量变量间的关联性，从而在多维空间中更准确地衡量个体间的整体相似性，较好地控制其他两个维度的民粹倾向。这一策略确保了在可观测特征的条件下，干预组与控制组的对外政策态度差异，可被解释为某一维度民粹倾向的因果效应。

在完成匹配后，作者对协变量的平衡性进行了系统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的标准化均差均显著下降，干预组与控制组在其他两个维度的民粹指数上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匹配效果良好。进一步地，为验证样本之间的重叠性（overlap）或共同支撑区间（common support）是否充分，本文还比较了不同匹配方案下的成功匹配比例。结果显示，在以政治维度为干预变量、控制经济与文化维度的匹配中，成功匹配率为 79%；在以经济维度为干预变量、控制政治与文化维度的匹配中，成功匹配率为 32%，虽然这一比例略低，但是有效匹配样本也达到 405 个；而在以文化维度为干预变量、控制政治与经济维度的匹配中，成功匹配率为 90%。总体而言，经匹配后的样本在其他两个民粹维度上的分布已高度相似，满足重叠性与平衡性要求，因此，其能够较为稳健地识别出某一维度的民粹倾向对相应回对外政策偏好的平均干预效应。

四、民粹倾向与对外政策偏好的因果分析

利用匹配的方法，本文对政治、经济与文化三种民粹倾向对各自维度上的对外政策偏好的因果影响进行了估计，表-3 至表-5 展示了主要的估计结果。整体而言，三个维度的民粹倾向均对民众的对外政策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影响方向与前文所述的民粹主义理论预期一致。民粹主义者具有系统的对外政策态度，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的涉外议题上具有一致的政策取向。

^① Guido W. Imbens,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Under Exogeneity: A Review,”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6, No. 1, 2004, pp. 4-29.

表-3 政治民粹倾向与对外政策偏好的估计结果

干预变量	结果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国际事务态度 1=孤立主义	维护美国地位 1=弊大于利	维持现有盟友 1=非常无效	参与国际组织 1=非常无效	对待北约态度 1=完全退出	
政治民粹倾向	0.146 *** (0.045)	0.210 *** (0.044)	0.030 * (0.019)	0.089 *** (0.022)	0.070 *** (0.021)
干预样本量	1308	1308	1308	1308	1308
匹配样本量	1048	1048	1048	1048	1048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中显示 Adabie-Imbens 标准误。匹配协变量为经济民粹倾向与文化民粹倾向，采用马氏距离进行一对一最近邻匹配，卡尺为 0.2 倍标准差。

表-3 展示了具有政治民粹倾向民众的对外政策偏好。模型 1 至模型 5 分别估计了政治民粹倾向对五个不同对外政策结果变量的影响。模型系数均为正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在控制了经济与文化民粹倾向后，政治民粹倾向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支持民粹主义式的外交立场。具体而言，政治民粹主义显著提升了个体持有孤立主义态度的概率（系数 = 0.146, $p < 0.01$ ），即在国际事务中主张“美国应减少对外介入”的倾向。同时，其也显著增加了受访者认为维持美国世界地位“弊大于利”的比例 (0.210, $p < 0.01$)，反映出民众对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质疑。从实质效应来看，相较于政治民粹倾向较低的个体，政治民粹倾向较高者持孤立主义态度的概率上升了约 15 个百分点，这一幅度相当于样本中孤立主义态度均值的三分之二，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此外，政治民粹倾向还正向影响民众对盟友、国际组织以及北约的负面看法（系数分别为 0.030、0.089、0.070）。这些系数在幅度上虽较前两项略低，但仍具有实质意义，如政治民粹得分高于均值的个体，其主张“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提高约 9 个百分点，提倡“退出北约”的概率提高约 7 个百分点。综合来看，政治民粹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出“反多边主义”的鲜明特征，他们倾向于认为美国应减少对外承诺，并弱化对国际组织的支持。这与典型的民粹主义政治叙事相符，即强调“人民主权”并反对“全球精英共谋”。

表-4 经济民粹倾向与对外政策偏好的估计结果

干预变量	结果变量	
	模型 6	模型 7
	征收关税态度 1=非常有效	全球贸易态度 1=并非优先
经济民粹倾向	0.070 *** (0.010)	0.081 *** (0.017)
干预样本量	1285	1285
匹配样本量	405	405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中显示 Adabie-Imbens 标准误。匹配协变量为政治民粹倾向与文化民粹倾向，采用马氏距离进行一对一最近邻匹配，卡尺为 0.2 倍标准差。

表-4 显示了经济民粹倾向对经济政策领域的对外政策态度的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民粹倾向越高，个体越可能支持民粹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具体而言，经济民粹倾向显著提升了受访者认为“征收关税是非常有效的政策”的概率 (0.070 , $p < 0.01$)，同时也显著降低了受访者认为“全球贸易应是美国外交优先事项”的可能性 (0.081 , $p < 0.01$)。从实质效应来看，经济民粹主义倾向高的民众支持关税的概率比低民粹倾向群体约高 7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揭示出，在面对全球化与贸易竞争时，有民粹倾向的选民更愿意保护本国劳动者与产业，反对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实证结果亦表明，全球化带来的分配冲击促使部分群体转向经济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立场。

表-5 文化民粹倾向与对外政策偏好的估计结果

干预变量	结果变量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价值观外交态度 1=强烈反对	民主制度态度 1=并非普世	民主倒退态度 1=并非威胁	对多样性态度 1=毫无益处
文化民粹倾向	0.102 *** (0.028)	0.093 *** (0.042)	0.088 *** (0.029)	0.158 *** (0.022)
干预样本量	1052	1052	1052	1052
匹配样本量	950	950	950	95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中显示 Adabie-Imbens 标准误。匹配协变量为政治民粹倾向与经济民粹倾向，采用马氏距离进行一对一最近邻匹配，卡尺为 0.2 倍标准差。

表-5 展示了具有文化民粹倾向的民众所对应的对外政策偏好。四个模型

的系数均为正且在 1% 水平显著，这说明文化民粹主义者在文化维度的对外政策偏好上呈现明显的排外与反普世价值倾向。具体而言，文化民粹倾向显著提升了受访者对在全球范围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反对程度 ($0.102, p < 0.01$)，且更容易认为“民主对一些国家并非最好” ($0.093, p < 0.01$)，并且提高了认为“民主倒退并非全球威胁”的比例 ($0.088, p < 0.01$)。同时，他们也更倾向于认为“不同种族和国别的多样性对美国没有益处” ($0.158, p < 0.01$)。这些效应不仅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具有很大的实质意义。在文化民粹倾向较高的群体中，反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人权与民主的比例比低民粹群体约高出 9 至 16 个百分点。整体而言，文化民粹主义者对外政策态度体现出鲜明的“文明边界”意识，他们认为美国应在推广普世价值方面减少对外干预，并对外界“他者”保持距离。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还进行了多种敏感性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es)。首先，改变 caliper 取值 (0.1 至 0.5) 后，点估计 (point estimation) 变动幅度不超过 ± 0.03 ，显示结果对匹配设定不敏感。其次，将干预变量的阈值划分改为 40% 或 60% 分位数后，相关结果依然稳健。总体而言，三个维度的民粹倾向对相应领域外交政策态度的正向效应具有高度一致性与稳健性。

综上所述，实证结果发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优先”式的民粹主义外交并非纯粹源自个性化的领导风格，而是在社会层面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政治民粹主义者的孤立主义与反多边主义态度、经济民粹主义者的反全球化与保护主义取向，以及文化民粹主义者的反价值观外交立场，共同构成了特朗普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民意土壤。这就意味着，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外交路线，无论是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与《巴黎协定》，还是对全世界征收高额关税，抑或是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均在公众的价值认同与对外政策偏好中找到了可观的社会基础。换言之，特朗普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其实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民粹主义价值体系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外化。

五、“特朗普 2.0”时期的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

以上的量化分析采用的是 2022 年的民调数据，为了进一步说明“美国优先”长期化趋势，本节将以 2025 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外交政策作为分析案例，进一步揭示民众的民粹主义立场与外交政策的联动机制。总体而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民粹主义外交延续了其第一任期的实践，但在策略上更为系统、在力度上更为激进。这与保守派选民的政治不信任、经济焦虑与

文化认同危机持续走高密切相关。

在政治维度，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反多边主义”外交实践，是对保守派选民普遍性政治危机感的制度化回应。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长期追踪数据，在 2024 年，只有 22% 的美国人表示信任联邦政府，而在共和党支持者中，这一比例更低，仅有约 11%，并且多数人认为“华盛顿被腐败精英所掌控”。^① 2025 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最新民调也显示，仅有约 40% 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美国应在重大外交决策中与盟友进行协商。^② 这表明，共和党选民对国际制度与多边承诺持有更强烈的怀疑态度。这种对政治建制与国际制度的普遍怀疑情绪，为特朗普推行民粹主义外交提供了坚实民意支撑。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取向具有更强势的单边主义特点。一方面，特朗普不愿意美国为其他国家或全球事务付出巨大资源，要求美国盟友增加共同防御的军费开支，从而降低美国在维护全球安全方面的负担；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停止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活动，并冻结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的全部资金，同时要求审查美国对所有国际组织与多边条约的财政贡献与成员资格。由此，特朗普民粹主义外交不仅重塑了美国的外交决策逻辑，也进一步侵蚀了美国全球主义的制度根基，预示着国际多边主义机制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将持续加剧。

在经济维度，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反全球主义”立场同样与共和党选民的经济危机感密切相连。根据 2025 年最新的盖洛普调查数据，63% 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关税在短期内会给美国带来更多资金，77% 的共和党民众认为，关税在长期对美国有利，其中，保护主义政策在“锈带州”与低教育程度、低收入群体中支持度最高。^③ 2025 年，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伊始迅速重启并升级全球贸易战。2025 年 2 月，他利用发布总统行政令和官方宣言等方式，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全面加征关税，并援引《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铁、铝、汽车等关键行业征收 25% 关税。^④ 4 月 2 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对来自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并对贸易逆差较大的国

^①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1958-2024,”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4,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4/06/24/public-trust-in-government-1958-2024/>.

^② Dina Smeltz and Lama El Baz, “US Public Support for Alliances at All-Time High,”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October 14, 2025, <https://globalaffairs.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us-public-support-alliances-all-time-high>.

^③ Megan Brenan, “Most Americans Skeptical About Benefits of Tariffs,” Gallup, April 28, 2025, <https://news.gallup.com/poll/660002/americans-skeptical-benefits-tariffs.aspx>.

^④ “Adjusting Imports of Aluminum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djusting-imports-of-aluminum-into-the-united-states/>.

家追加“对等关税”。^①随后，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正式升级为全方位的关税对抗。虽然特朗普更多地将关税作为极限施压的手段，但是，美国对全球征收的10%基准关税客观上损害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②可以说，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国际经贸领域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兼具象征性与实际价值，既向选民展示自己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强硬形象，又以关税与制造业回流等形式向右翼民粹选民兑现选举承诺。

在文化维度，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反价值观外交”同样呼应了保守派选民的文化焦虑与身份防御心理。根据2025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83%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大规模移民与难民涌入美国构成国家的重大威胁”，这一数值达到历史最高，其中，71%的共和党民众密切关注移民相关新闻。^③民众的这种高度关注与强威胁感知，反映的并不仅是经济或治安层面的担忧，而是折射出他们更深层的身份认同危机与文化焦虑。保守派选民将持续增长的移民规模视为对传统价值、社会秩序及“美国身份”的冲击，这种文化防御心理正是特朗普“反价值观外交”叙事的重要民意基础。因此，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其在文化维度的外交政策凸显为系统性削弱“普世价值”议程，并大规模重塑与推行价值观外交相关的涉外官僚机构。^④其一，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7月1日正式关闭了在美国“人权与民主外交”中长期发挥核心作用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将其主要职能并入国务院。经国务院审查后，在原有约6200个援助项目中，超过5200个项目被终止，削减比例超过80%。^⑤特朗普表示，海外援助支出必须与其“美国优先”方针保持一致。国务卿鲁比奥则强调，所有对外资金的使用都应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其二，特朗普于3月14日签署行政令，将美国国际媒体署(USAGM)的运作缩减至法

^①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Declares National Emergency to Increase Our Competitive Edge,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Strengthen Our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White House, April 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4/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declares-national-emergency-to-increase-our-competitive-edge-protect-our-sovereignty-and-strengthen-our-national-and-economic-security/>.

^② 《中国政府关于反对美国滥施关税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5年4月5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4/t20250405_11588935.shtml。

^③ Craig Kafura, “Republican Concerns over Immigration Hit All-Time High,”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ugust 2, 2024, <https://globalaffairs.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republican-concerns-over-immigration-hit-all-time-high>.

^④ 付舒：《解构“深层政府”：美国涉外官僚机构与人事任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9期，第46—75页。

^⑤ 李向阳等：《全球右翼浪潮兴起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第17页。

律允许范围内的最低限度，暂停美国之音（VOA）与自由亚洲电台（RFA）的部分节目，并冻结约 6 亿美元的海外广播预算。尽管法院一度中止执行该命令，但国会最终仅恢复约 40% 的拨款。其三，特朗普政府冻结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约 2.4 亿美元的国会拨款。这一机构长期通过国务院资助全球约 2000 个致力于推动人权、新闻自由、法治与民主的相关组织。^① 这些文化层面的政策既回应了保守派选民根深蒂固的身份焦虑与排他心理，也进一步巩固了特朗普在文化维度上的“反价值观外交”。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优先”长期化恐怕并不局限于共和党政府。近年来，在执政实践中，民主党同样面临国内民众反全球化情绪的持续约束。以拜登政府为例，其在贸易和产业政策方面事实上延续了前任的诸多关键举措：继续保留对华高额关税，^② 强化“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③ 推动制造业回流与供应链重组，^④ 并在关键技术领域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⑤ 从公众舆论基础来看，美国社会对自由主义外交传统的支持已失去广泛的根基。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2025 年的调查显示，虽然 71% 的美国人仍认为同盟关系“重要”，但仅有 38% 受访者希望美国“在全球扮演更积极角色”。这意味着，即便未来实现了政党轮替，美国外交仍将受到保守派社会焦虑与民粹主义情绪的深层约束，其内向化与民粹化倾向恐将长期存在，难以出现根本性逆转。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民主党总统上台，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特朗普化”的共和党国会，其中许多民选议员延续了右翼民粹的政治立场，在国际承诺、国际贸易、价值观外交以及对华政策等议题上对行政部门持续施加压力。总而言之，主张“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情绪已嵌入美国外交政策的社会与制度结构之中，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外交的内向化与民粹化倾向将长期存在。

^① “Statement on NED’s Funding Disruption and Program Suspension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February 25, 2025, <https://www.ned.org/statement-on-neds-funding-disruption-and-program-suspensions/>.

^② Elijah Asdourian and David Wessel, “What Are Tariffs, and Why Are They Rising?” Brookings,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at-are-tariffs-and-why-are-they-rising/>.

^③ 高攀、许缘：《综述：拜登宣布收紧“买美国货”政策招批评》，新华网，2022 年 3 月 5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2-03/05/c_1128441801.htm。

^④ 孙成昊、申青青：《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美国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113—137 页。

^⑤ 韩召颖、刘锦：《拜登政府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国际展望》，2023 年第 6 期，第 21—39 页。

结语

本文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揭示了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民意基础。研究表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外交，并非领导人个性风格变化的偶发产物，而是深植于美国社会结构性危机与集体不安情绪的政治表达。政治民粹主义者的“反多边主义”、经济民粹主义者的“反全球化”以及文化民粹主义者的“反价值观外交”，共同构成了这一外交取向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美国外交的民粹化并非短暂的历史插曲，而是美国国内的政治信任缺失、经济不平等与文化认同焦虑的外溢结果。在民粹化的美国民众眼中，美国应优先实施“收缩”与“克制”的外交政策。正如迈克尔·赫希所言，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已经名存实亡，或者至少来说，那种在二战后与冷战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作为世界警察”（America-as-globocop）的观念，已经彻底崩塌了。^①

可预见的是，即使在特朗普卸任之后，这种由民众焦虑感所支撑的民粹政治逻辑仍可能长期影响美国未来的外交方向，推动其在国际秩序中延续更具防御性与内向化的政策取向。即便未来出现党派轮替、民主党重新执政，右翼民粹化的社会结构也将继续约束继任领导人的外交活动空间，美国政府或许会在表面上恢复支持多边主义的姿态，但在贸易、产业与安全政策上仍会保持谨慎、务实乃至防御性的色彩，美国外交政策不太可能真正回到冷战后的自由国际主义轨道。换言之，民粹主义的阴影已经深深嵌入美国外交决策的社会结构中，其影响将超越个别领导人的更迭，成为美国政治的一种长期底色。

（责任编辑：吴文成）

^① Michael Hirsh, “Why Everyone in Washington Is a ‘Realist’ Now,” *Foreign Policy*, August 8, 202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8/08/washington-realistic-united-states-dominant-power/>.

relations, populism-driven xenophobic sentiments have given rise to “national security” as a new diplomatic imperative. Takaichi has linked the so-called “Taiwan contingency” to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collective self-defense, grossly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endange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er erroneous remarks and reckless actions regarding Taiwan are extremely irresponsible and dangerous, pos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China-Japan relations and regional peace.

Key words: Sanae Takaichi, the “Abe Line”, populism, Japan-U.S. alliance, China-Japan relations

“America First” Endures: The Public Roots of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FU Shu

Abstract: The rise of American populism, particularly the right-wing populist surge exemplified by Donald Trump, has reshaped the landscape of U. S.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elineating the core tenets of American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and its public opinion basis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U. S. diplomacy. Theoretically, the “America First” agenda can be conceptualized along three dimensions: *anti-multilateralism* in the political domain, *anti-globalism* in the economic domain, and *anti-value-based diplomacy* in the cultural domain. Empirically, this study draws on two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s: the 2020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 and the 2022 Survey by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CCGA). By adopting cross-survey imputation and matching methods, it identifi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Americans’ sense of crisi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populist foreign polic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olitical populist tendencie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isolationism, contempt for allies, and opposi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conomic populist tendencies notably increase support for tariffs; and cultural populist tendencies reinforce rejection of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multicultural values. The evidence demonstrat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s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is no coincidence. Endowed with extensive 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foundations, it emerges as a spillover effect of domestic political distrust,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cultural anxiety. This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is likely to exert a long-term impact on U.S. foreign

policy practices, perpetuating a more inward-looking policy orient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 words: “America First”,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public opinion, Donald Trump, domestic politics

Securitization and the Revolving Door: Formation of the U.S. Consensus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PENG Zhifeng LI Zhiyong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long-term engagement with China had fostered the emergence of the engagers as a dominant advocacy coalition for its China policy. However, as China’s continuous rise increasingly challenged American hegemony, skepticism and hostility toward China gained traction within the U.S. foreign policy community. By around 2015, these sentiments had coalesced into a rival advocacy coalition: the competitor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policy has completely undermin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engagement policy and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of a consensus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dopting a meso-level perspective on foreign policy change, this article refines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by integrating insights from securitization theory and the revolving door phenomenon, and thus offers a robust analytical lens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is consensus. First, at the societal level, competitors initiated the securitization agenda through discursive salience. Subsequently, at the governmental leve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elevated their agenda into official stance through discursive framing. Competitors began to shape the perception of the “China threat” with a more radical posture, pressuring the engagers to accept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sensus. Furthermor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leveraged the revolving door to recruit competitors-aligned experts into key China-policy positions, solidifying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sensus through policy practices. The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advocacy coalition has dominate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U.S. cognitive shift on China. Looking ahead, as the 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sensus toward China deepens, the trajectory of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arrants further academic inquiry and policy attention.

Key words: China-U.S. relations, Trump administration, foreign policy change, advocacy coalition, securitization, revolving door